学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推进西部金融中心建设

智库头条

将重庆建设成为西部金融中心，不仅有利于改善长期以来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状态，促进我国金融资源合理分布、实现金融资源适度集聚与分散发展，释放中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潜力，也有利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贯彻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探索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乡村振兴、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有效模式，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金融体系。

□王煜宇

近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研判国内外金融发展的规律趋势，科学认识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金融需求，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经验逻辑，深刻反思当前金融体系难以匹配新格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障碍，前瞻谋划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以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会议，在党和国家金融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里程碑意义。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服务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将重庆建设成为西部金融中心，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贯彻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现实需求，是解决我国金融发展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的重要战略抓手。不同于世界工业化和贸易自由化早期所形成的伦敦、纽约、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以及改革开放前期所形成的上海、深圳等国内金融中心，重庆打造西部金融中心既面临经济贸易金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的严峻挑战，也面临开放格局转型迭代，工业经济和资本金融深度调整，数字技术、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科技（产业）金融、数字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高速演进的崭新机遇。学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应把握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战略意义与结构功能，立足重庆乃至整个西部经济金融发展的关键问题与核心需求，抓住国际国内“大变局”的时间窗口，用好经济金融深度转型的战略机遇，发挥比较优势，激活后发优势，将重庆的区位优势、区域特征、产业特征、发展方向、自然禀赋与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目标、建设规划、建设路径深度融合，创新数字金融技术及其应用场景，建设服务“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贸易（开放、消费）金融中心、服务工业4.0和西部制造2025的产业（科技）金融中心、服务西部农村和其他金融抑制群体的普惠（乡村振兴）金融中心、服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绿色金融中心，优化金融产业布局与结构调整、健全配套制度与基础设施、完善推进机制与法治保障，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提升重庆金融的集聚度和辐射力，推动双城经济圈乃至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金融中心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产物，是金融行业、金融机构、金融资本高度聚集，金融设施、金融服务、金融市场高度发达，金融产品、金融交易、金融信息高度活跃，能够进行高效率多层次大规模跨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中心城市。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包括聚集辐射、资源配置、清算结算、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建设金融中心，不仅能够显著增强所在城市经济金融的能级实力，也能够辐射、带动、牵引周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2021年3月1日，《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建设西部金融中心”；2021年4月9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天津、上海、海南、重庆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批复》（国函〔2021〕37号），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批复》，商务部于同月21日印发《重庆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商资发2021年第65号），明确重庆探索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原则；2021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将“打造西部金融中心”作为提升重庆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的目标抓手；2021年12月14日，人民银行等六部委联合重庆市、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基本确定。当前，正值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向“2025年基本建成”的规划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要从战略性、全局性的高度把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将其贯彻落实到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具体推进中，增强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根本性、系统性和实效性，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贯彻“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的会议要求，深刻认识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战略需求和总体功能；二是贯彻“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服务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的会议要求，准确定位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关键目标和核心内容；三是贯彻“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的会议要求，针对西部金融中心服务实体经济的现实问题，靶向施策、具体推进；四是贯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会议要求，深化优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重庆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尽快形成与西部金融中心投融资规模相匹配的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处置能力体系；五是贯彻“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金融法治建设”的会议要求，充分发掘重庆特有的金融文化资源和法治资源，统筹营造好西部金融中心金融生态。

学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建设西部金融中心，要认清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战略需求和总体功能

不同于世界工业化和贸易自由化早期所形成的伦敦、纽约、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以及改革开放前期所形成的上海、深圳等国内金融中心，将重庆建设成为西部金融中心，是在数字技术、金融科技蓬勃发展，工业经济资本金融深度调整，产业金融、数字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高速演进的历史趋势下；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转变、经济社会发展迭代新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对外开放形成新格局的时空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策。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极不充分、东西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极不均衡。东部地区金融中心集聚，机构数量、基础设施、产业品类、交易能级、存贷余额、人才质数远远高于西部地区。东西部地区金融资源的不对称配置不仅导致我国金融城乡二元、地区二元、虚实二元等结构性矛盾突出，也加剧了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差距，不利于“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作为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既是处于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内陆开放高地”，也是大农村与大城市相结合、实体经济基础雄厚、数字经济动能强劲的“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将重庆建设成为西部金融中心，不仅有利于改善长期以来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状态，促进我国金融资源合理分布、实现金融资源适度集聚与分散发展，释放中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潜力，也有利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贯彻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探索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乡村振兴、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有效模式，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金融体系。

学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建设西部金融中心，要明确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关键目标与主要内容

全新的战略功能与总体需求决定了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必须抓住国际国内“大变局”的时间窗口，用好经济金融深度转型的战略机遇，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激活后发优势，将重庆的区位优势、区域特征、产业基础、发展方向、自然禀赋与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目标、建设规划、建设路径深度融合，准确定位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关键目标和核心内容。重庆辐射西部、连接东西、通江达海、联动中亚与东南亚、沟通亚欧大陆的显著区位优势，决定了建设服务“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贸易（开放、消费）金融中心是西部金融中心的首要目标；重庆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基础和“数字重庆”“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决定了建设服务工业4.0和西部制造2025的产业（科技）金融中心是西部金融中心的核心内涵；重庆大农村与大城市相结合的区域特征，决定了建设服务广大农村和其他金融抑制群体的普惠（乡村振兴）金融中心是西部金融中心的重要功能；而重庆“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自然禀赋，则决定了建设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愿景的绿色金融中心是西部金融中心的迫切使命。

学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建设西部金融中心，要把握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具体路径

与上述贸易（开放、消费）金融中心、产业（科技）金融中心、普惠（乡村振兴）金融中心、绿色金融中心的建设目标相比，当前重庆金融发展存在经济金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基础设施薄弱，科技驱动和开放创新抓手不足，配套政策与生态体系滞后等显著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应坚持“产业为本，金融为用”的基本原则，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与资金链融合工程，大力培育新型供应链金融企业，打造面向全国的产业融资平台。应在培育内外资金融机构法人总部和功能性区域总部的同时，加快设立服务“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性商业银行、国际绿色发展银行、国家科技银行，设立跨境商品交易、多式联运物流交易及投融资对接的一体化交易场所，设立西部（铁矿石、天然气、再生铝）期货交易所、西部碳排放交易所、西部农副产品交易中心、西部数据交易中心、西部“新四板”等。其次，应争取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西部分中心落户重庆，建立大额实时支付清算系统、小额批量支付清算系统、西部票据交换系统，推进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央行进行人民币清算的安排，推动全国性证券、商品及期货交易所在重庆设立交易系统和数据备份中心。再次，高水平建设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开展数字人民币、国家金融科技应用和金融标准化创新试点，利用全国首个省级区块链应用创新产业联盟的优势，从供应链金融、普惠金融、跨境支付三个领域着手搭建全产业链条，加大对征信、票据、数字货币、清算结算、股权交易多个应用场景的探索。最后，积极争取国家层面成立“西部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并常设办公机构，及时颁布《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推进实施方案》。

学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建设西部金融中心，要深化重庆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改革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包括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重庆证监局、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重庆地方金融监管供给侧，应在落实中央有关机构改革要求基础上，以建成与西部金融中心投融资能力相匹配的风险监管体制为目标，以数字化、穿透性和协同性为方向，协调财政、发改等相关部门，迭代重庆地方金融监管的信息机制和监管方式。当前，尤其需要探索落实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市场化、法治化机制，建立地方政府债券保险制度和偿债准备金制度，形成科学合理的容错纠错机制和激励性责任分担制度，落实地方政府债务违约责任，依法保障投资者合法权利。

学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建设西部金融中心，要充分发掘重庆特有的金融文化资源和法治资源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金融法治建设”。重庆拥有独特的“以义取利、义利天下、包容开放、诚实守信”的金融土壤和文化资源；中西部唯一专门金融法院的基础设施、西南政法大学的专业加持，又使得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拥有得天独厚的法治生态优势。从金融生态的维度，打造西部金融中心的实质，就是通过在微观上培育科创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创新金融生态主体群落，在中观上优化金融市场一体化交易设施和交易机制，在宏观上提升成渝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监管透明度和金融法治水平，从而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协调共生的金融行业、金融机构、金融资本高度聚集，金融设施、金融服务、金融市场高度发达，金融产品、金融交易、金融信息高度活跃，能够稳定持续、动态平衡地进行高效率多层次大规模跨时空金融资源配置的核心区域。西部金融中心金融生态应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文化建设为抓手，微观、中观、宏观三管齐下。当前，应着力协同成渝两地立法主体、执法主体、金融法院和监管当局，推动符合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目标的成渝一体化的框架性法律、优惠性法律、监管性法律和试点性规则尽快落地；加快形成科创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一带一路”投资等的示范案例和审判标准；创新金融纠纷化解模式，建立主要面向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金融仲裁（调解）中心、跨区域金融纠纷非诉调解机制（ADR）和金融纠纷在线调解平台（ODR）。以制度的便利性和法治环境的先进性培育吸引金融生态主体群落，持续激发金融中心聚集辐射功能。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金融法治研究院院长，重庆市新型重点智库中国特色金融法治智库首席专家）

推进川藏公路世界级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建设

决策建议

□张玉蓉 哈柳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重点建设川藏公路等25条国家旅游风景道。川藏公路沿线拥有众多世界级自然和人文资源，加快推进川藏公路世界级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建设，有助于将其打造为世界知名廊道旅游目的地，成为中国公路旅游国家名片，带动国家旅游风景道体系建设。

明确旅游廊道范围和目标。川藏公路世界级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的建设需要进一步明确廊道范围等级及目标定位。一是明确旅游廊道范围等级。川藏公路东起成都，西至拉萨，分为南线和北线。应将川藏公路南线和北线有机连接，打造一条旅游大环线，并以南北线为主干打造两条核心轴线。根据资源分布和交通网络布局对廊道进行合理分级，将川藏南线和川藏北线两条主轴划分为一级廊道，主轴间重要联结通道划分为二级廊道。二是明确旅游廊道目标定位。要以廊道生态和文旅资源保护为基础，突出世界级旅游廊道整体形象和局部形象设计。坚持低碳、低干扰、低强度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原则，厘清大型跨区域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活化利用契合途径，构建原生态、原生活的旅游产品体系，建设集自然和文化观光、民俗文化体验、生态休闲度假、户外运动、科普科考等功能于一体的世界级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打造中国公路旅游国家名片。

厘清旅游廊道构成要素。川藏公路沿线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资源禀赋高，应进一步加强旅游廊道资源谱系调查，系统梳理单体旅游资源、旅游景区景点和特色文化区等构成要素，夯实廊道建设基础。一是厘清廊道单体旅游资源，包括各级各类自然资源、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对丹巴古碉群、德格印经院、格萨尔史诗、藏族唐卡等具有代表性的单体旅游资源，应进一步加强自然文化资源保护与旅游活化利用。二是厘清廊道旅游景区景点，包括历史文化名城（镇、村）、特色小镇、旅游景区、自然保护区等。如对康定、布达拉宫、大昭寺、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雅鲁藏布大峡谷自然保护区等代表性旅游景区景点，应注重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与景区景点建设有机结合，制定科学的旅游发展规划。三是厘清廊道特色文化区。廊道文化资源丰富，可根据不同主题分为四大类：路域生态文化、路域历史文化、路域民族文化、公路建设文化。

优化旅游廊道空间布局。从“节点—轴线—域面”有机联动视角对川藏公路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的空间布局进行优化，突出旅游节点辐射作用，推动旅游线路联动发展，强化旅游板块功能分区，打造“一环、两轴、八区”的旅游空间格局。一是突出旅游节点辐射作用。重点突出成都、拉萨两个极核的带动作用，加强康定、理塘、林芝、丹巴等核心节点作用。注重以旅游节点为中心向周边区域辐射，以此推动旅游廊道及周边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二是推动旅游线路联动发展。要对川藏公路沿线绿道系统、特色村寨、风情小镇、汽车营地等进行合理规划，打造精品公路旅游产品，从而形成廊道独特的历史人文线、自然风景线和生态旅游线。加强茶马古道、唐蕃古道等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交通遗迹遗存的保护与活化，注重现代交通重大工程的保护利用和精神挖掘，打造特色交通文化旅游线，推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强化旅游板块功能分区，综合考虑廊道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地域特色等因素，重点打造环贡嘎山山地运动旅游体验区、嘉绒风情体验区、岷江河谷藏羌风情体验区等八大旅游廊道示范区。

完善旅游廊道支持体系。加强川藏公路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保护和文旅产业发展的相互支撑，不断完善廊道支持体系。一是构建绿地生态系统。川藏公路沿线分布着世界自然遗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应当以川藏地区的“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文化旅游发展规划为抓手，进一步完善“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旅游廊道绿地生态系统。二是构建交通通达系统。借鉴美国蓝岭风景道、意大利阿匹亚古道文化线路、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成功经验，因地制宜建设川藏公路国家旅游风景道。根据需求增设自行车道、步道等慢行设施，构建绿色低碳、生态环保的廊道慢行体系，打造国家公园体验、川藏公路骑行等特色旅游产品，通过“慢游”加强游客廊道旅游的深度体验。三是构建公共服务系统。加强廊道沿线区域协同，搭建智慧旅游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推动旅游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构建廊道解说系统，提炼廊道解说主题，丰富廊道解说媒介，完善廊道标识系统，通过川藏公路讲好中国故事，打造国际范、中国味、川藏韵的世界级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廊道。

（作者单位：重庆交通大学旅游与传媒学院，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3AJY012成果）

思想周刊投稿邮箱：cqrbsixiang@163.com

资政参考

以高质量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贾书源 陈逢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高校具有创新要素集聚、创新人才汇聚、创新成果凝聚的优势，但面临产业化水平低、转化利用率低、技术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加快高校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促进高校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推动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对于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升产业竞争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具有重大意义。

深化人才教育改革，实现学生培养与产业发展对接。一是增强面向实践的创新能力。实施“通专融合+创新教育”的培养模式，探索创新团队、科创班、创新实验班、校企订单式培养等多样化创新创业人才成长途径。加强PBL、“翻转课堂”教学方法的引入，优化“企业家+教师”共同授课、“校内课堂+校外实践”联动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教育的教学模式。推动课程由知识讲授型向演示体验、探索训练、任务驱动和实践创造型发展，将室外拓展、游戏体验、沙盘模拟、团队合作、商业画布、孵化参观、资本对接等引进课堂。二是推进高校和地企深度融合。发挥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科研转化、高端智库等优势，积极融入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发展建设。将高校科技成果和地方实践场景相结合，发挥地方政府区域、经济、产业等优势和高校科教、信息、人才等优势，强化信息互通、科研互动、产业对接、产教融合。在知识产权创造和管理、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人才交流合作、科技研发机构和开发基地建立、科技决策及科技咨询交流、师生创业实践等方面构建起合作交流的长效机制。推进高校与高校，高校与政府、企业间的协同，建立结构调整、多样合作、交叉培养新机制。三是融通创新创业支持机制。给予一流专业的教师适当的政策倾向，将教师被动接受任务转化为主动参与实践教学，同时为教师提供专项培训，提高教师的产业认知和实践教学能力。聘请校外企业家或创业者做兼职双创导师，引进技术人员专门指导实践操作，扩充师资队伍。通过人性化的人才激励机制，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制度、畅通的晋升渠道，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创新环境和文化氛围等，充分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

完善知识产权管理，提高源头成果质量和转化效率。一要提升源头成果质量。围绕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和重大需求，结合学科优势，建立大体量、多学科、开放式的创新平台，开展前瞻性科学问题研究、颠覆性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启动“关键科学问题”和“卡脖子关键技术攻关”行动计划，从源头强化创新能力供给。二是提升转移转化效率。成立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工作，让技术转移研究中心、信息服务中心、专利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大学科技园管理办公室等部门共同承担管理服务职能。建立知识产权、专利代理等市场化专业服务机构，形成集战略决策、管理维护、创新研究、运营服务、转移转化为一体的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管理服务体系。三是完善成果转化保障机制。以质量和转化金额为导向，在对科研人员的绩效考核、职称评定、岗位聘任和人才评价时将成果转化纳入考核体系，畅通应用型人才职称评定及职务晋升通道。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容错免责机制，建立适当条件下有关人员的免责制度。调整优化科技奖励制度，规范提名制度和流程，优化奖励项目、提高奖励质量，奖励真正做出创造性贡献的科学家和一线科研人员。

夯实技术基础设施，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应用。目前我国科技研发活动及部分高质量科技资源主要集中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而技术应用的主体集中在企业，技术基础设施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是连接基础研究成果和产业化应用的桥梁。首先，应统筹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前瞻布局。要深刻认识到技术基础设施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性，确立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地位，加强创新的宏观战略研究，强化对国际科学前沿重点领域和方向的谋划，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特别是要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和行业发展方向，加强技术基础性设施建设的战略谋划和前瞻部署，扎扎实实打基础，集中力量构建和完善技术基础设施。其次，加大共性技术和基础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应加强财政资金对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重点投向共性技术、基础技术等影响创新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开展共性关键技术和行业基础技术的研发，夯实创新发展的基础，完善创新发展链条，着力破解制约创新发展的瓶颈。此外，应支持和引导高校和企业共同参与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应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导向，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基准，通过政产学研用产业创新联盟等新模式，充分吸纳企业参与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发挥行业骨干企业的主导作用以及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基础科学研究作用，形成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产用结合、以市场促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机制，加快技术积累和科研成果转化。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1SKSZ002成果）